

张炎词集辨证

谢 桃 坊

一

张炎是宋代最后一位词人，也是宋词的光辉结束者。他的词集名《山中白云词》，存词三百首。宋遗民仇远说：“读《山中白云词》意度超玄，律吕协洽，不特可写青檀口，亦可被管弦荐清庙，方之古人，当与白石老仙（姜夔）相鼓吹。”（《山中白云词序》，《山村遗集》卷一）元大德四年庚子（1300），张炎五十三岁时已将词初步结集，并请友人为序。邓牧说：“盖其父寄闲先生善词名世，君又得之家庭所传者。中间落落不偶，北上燕南，留宿海上，憔悴见颜色；至酒酣浩歌，不改王孙公子蕴藉，身外穷达，诚不足动其心，馁其气。庚子岁相遇东吴，示予词若干首，使为序云。”（《张叔夏词集序》，《伯牙琴》）此后的十余年间，张炎尚有新作不断补入，其最迟的词有纪年者为延祐元年（1314）甲寅秋寓吴作的《临江仙》。张炎的词集以抄本在元代流传，散佚甚少。现在所知此集的祖本是元末学者陶宗仪的手抄本。这个抄本于明代成化二十二年丙午（1486）由井某偶然所得。井某《玉田词题识》云：“成化丙午春二月朔，偶见是帙鹤城东门药肆，即购得之，南村先生（陶宗仪）手抄者，盖百余年矣，凡三百首，惜无录目，五月初九日辑录，以便检阅。”

（龚翔麟刊本《山中白云词》附）陶抄本在清初为钱中谐所藏，词家朱彝尊从钱氏转抄，分为八卷，由李符与龚翔麟取别本校

对，后附别本异文，并由龚翔麟镂板刊行。龚本较为真实地保存了陶抄原貌，为迄今所见最早的刊本，被誉“最为精审”。此后经曹炳曾翻刻，《四库全书》本与《榆园丛书》本都从龚本出。清代乾隆间学者江昱为张炎词集作校勘笺释，其《山中白云词疏证序》云：

词自白石后，张玉田不愧大宗，而用意之密，适肖题分，尤称极诣。率尔读之，虽击节叹赏，而作者苦心或未出也。夫集中之题，但云某人某地，读者亦仅就其词臆为人如是、地如是，是人与地因词而见，而不知词实有以确洽其人与地，何啻目眩珊瑚，木难而不能名耶！其或实有所指，而本题未能注明，则又往往忽略，甚且以宽泛之语，而曾不经意，可胜三叹。间与弟蔗畦，涉猎之余，遇可相发明者，辄笔之简端，垂二十年，翻书不下万卷，盖已得十之七八。……至其词之取抚宏富，蕴酿深纯，则所谓无一字无来处者，读者当自得之，不待颉颃为之诠释尔。

这个疏证本仍是八卷，征引宏富，考证精详，为迄今唯一的校笺本，故为朱孝臧《彊村丛书》采用，又被收入《四部备要》。自江昱疏证本流行后，龚本已甚为鲜见。但江本在编排与校勘方面与龚本略有相异。朱孝臧说：江本“以龚本裁缀成帙，其词后所附别本全章，概未之载。”（《山中白云词校记》）江昱将龚本内两存之别本异文全部删去。此外在校勘方面作了几处非常重要的改动。这几处词序与词题纪年的改动，向被认为江昱的创获，而一直为近世词家所沿用。仅近年出版吴则虞先生校本《山中白云词》乃以龚刻为底本，欲复原貌。江昱的几处校改纪年关系到张炎在南宋灭亡后北游的时间问题。按龚本，张炎自庚辰迄庚寅，北游十载；若按江本，则他自庚寅至辛卯，北游一年。北游是张炎生平的一件大事，关系着对其词与其政治品格的评价，是研究这位大词人的一个最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虽然江昱的校改

已为冯沅君与吴则虞两位先生考订张炎年谱作为依据^①，也为友人杨海明进一步证实^②，但窃以为仍然有必要辨证。兹试将江本与龚本比勘，并参校明抄本，则可发现：江本确有创获，而也有证据不足之妄改处。

二

龚翔麟《刻山中白云词序》云：“舒序（舒岳祥《赠玉田序》）所称（张炎）‘北游燕蓟’盖在少壮时，迨至元庚寅始返江南，而年已四十余矣。”江昱按云：“玉田以至元庚寅入都，辛卯南还，留北未久，此序‘北游燕蓟，盖在少壮时，殆至元庚寅始返江南’之语，盖缘《台城路》词‘庚辰之北’辰字之误，详见《台城路》词后。”（《山中白云词疏证》卷首）从版本校勘方面来考察，龚翔麟与江昱两说都是不能信凭的。龚翔麟校刊张炎词集时对陶抄有所校改，或有抄误之处，因陶抄本失传而无法比勘。江昱的疏证又在某些处未存旧文而妄加改动。张炎词集除陶氏元抄本而外，目前所存的明抄本尚有三种：一、明人吴讷编《唐宋名贤百家词》抄本中有《玉田词》二卷^③；二、明水竹居抄本《玉田词》二卷，吴则虞有校录本^④；三、明抄本《玉田词》一百五十首，清初宋荦藏，朱彝尊《词综》卷二十一据以收入三十九首。兹据三种明抄本比勘龚本与江本如下：

（一）《台城路》词序：

庚辰会汪菊坡于蓟北，相对如梦，回忆旧游，已十八年矣。（《百家词》本）

庚辰会汪兰坡于蓟北，想如梦，回忆旧游，已十八年矣。（水竹居抄本）

庚辰会江兰坡于蓟北，恍然如梦，回忆旧游，已十八年矣。（《词综》卷二十一）

庚辰九月之北，遇汪菊坡，一见若惊，相对如梦，回忆

旧游，已十八年矣。因赋此词。（龚翔麟本）

庚寅秋九月北上，遇汪菊坡，一见若惊，相对如梦，回忆旧游，已十八年矣。因赋此词。（江昱本）

以上五本，文字大同小异，“汪兰坡”、“江兰坡”，显为“汪菊坡”之误。汪菊坡事迹无考，从词序仅知其为张炎友人，他们曾相会于元大都。最值得注意的是前三种明抄本的纪年与龚本完全相同，都作“庚辰”，可见龚本此处是正确的，而且说明张炎实为至元十七年庚辰九月自江南北上燕蓟的。江昱以为“辰”字当是“寅”之误，于是校改，其依据是：“曾心传题日观葡萄自序，以至元庚寅入京，玉田固同行之侣，此题‘辰’字，当是‘寅’之讹。”这里暂且不论江昱所据的史实是否确切与充分，这样的校改也是完全违反校勘通例的。

（二）《甘州》词序：

辛卯岁，沈秋江同余北归，秋江处杭，余处越。越岁，秋江来访寂寞，语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词饯行，并寄曾心传。（《百家词》本）

辛卯岁，沈秋江同余北归，秋江处杭，余处越。越岁，秋江来访寂寞，晤语数日，又复别去。赋此饯行，并寄曾心传”（水竹居抄本）

饯沈秋江。（《词综》卷二十一）

庚寅岁，沈尧道同余北归，各处杭越。踰岁，尧道来问寂寞，语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舟。（龚翔麟本）

辛卯岁，沈尧道同余北归，各处杭越。踰岁，尧道来问寂寞，语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舟。（江昱本）

此词序四本，文字亦大同小异，《词综》所据明抄本当是原词序的简化。沈钦，字尧道，号秋江，与张炎为北游友人。江昱将龚本“庚寅”改作“辛卯”，他说：“按《大观录》曾心传自序谓

庚寅入京，前《台城路》词谓“庚辰九月”，“辰”字乃“寅”字之讹，辨见词后。《三姝媚》词观海云杏花，则系春日尚留燕京，而北归之非本年冬日，明矣。此庚寅自当从别本作“辛卯”为是。”两种明抄本纪年均是“辛卯”，龚本显然有误，不宜从。

(三)《疏影》词序：

辛卯北归，与西湖诸友，夜酌有感，书于水竹清隐。

(《百家词》本)

辛卯北归，与西湖诸友夜酌。(水竹居抄本)

余于庚寅岁北归，与西湖诸友夜酌，因有感于旧游，寄周草窗。(龚翔麟本)

余于辛卯岁北归，与西湖诸友夜酌，因有感于旧游，寄周草窗。(江昱本)

江昱按云：“‘庚寅’宜从别本作‘辛卯’。”《词综》未收此词。两种明抄本均作“辛卯”，这与《甘州》词序所记北归时间相同。从明抄本比勘《甘州》与《疏影》两词序的情形来看，江昱的校改是有根据的。据此，则张炎北归时间应是至元二十八年辛卯。这样，他自至元十七年北游，至元二十八年北归，则留寓燕蓟的时间实为十一年。

吴则虞先生校《山中白云词》于《台城路》词序采用龚本作“庚辰秋九月之北”，于《疏影》词序采用四印斋本并参别本作“余辛卯岁北归”。这与本文之考校不谋而合，足见吴先生审择精善。但是，他于《甘州》词序采用龚本“庚寅岁，沈尧道同余北归”，便与其所校《疏影》序相矛盾。尤其令人惋惜的是，吴先生据所校词，应断定张炎北游十年或十一年，然而在其所制《玉田年表》里却沿袭了江昱的庚寅之北、辛卯北归留燕一年之说^⑤。这又与其所校之《台城路》词序相矛盾了。

张炎《湘月》序亦有记年，这是否定北游十一年之说的有力证据。兹录龚本此词词序：

余载书往来山阴道中，每以事夺，不能尽兴。戊子冬晚，与徐平野、王中仙曳舟溪上，天空水寒，古意肖飒。中仙有词雅丽，平野作《晋雪图》亦清逸可观。余述此调，盖白石《念奴娇》鬲指声也。

戊子为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若张炎至元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在燕蓟，便不可能于至元二十五年冬又在山阴（浙江绍兴）与王沂孙（中仙）等友人曳舟溪上。因此，清人张惠言怀疑“戊子”有误，特批校云：“玉田以庚辰入都，庚寅归浙，戊子不得在山阴，盖当作‘戊戌’之误。”⑥据词序谓王沂孙“有词雅丽”记述此游，但今本《花外集》内王氏此词已佚，不能找到佐证。宋德祐二年（1276）即元至元十三年，二月元蒙军占领南宋都城临安。宋亡后，遗民王沂孙、张炎等曾聚会于山阴参加《乐府补题》咏物寄意的唱和活动，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之情。张炎北归时，王沂孙已经下世，而北游的十一年间他又不可能与王沂孙同游。因此，《湘月》序当作于宋亡之初与王沂孙于山阴咏物唱和之时，肯定不会作于“戊子”。张惠言以为当是“戊戌”，也不可能。戊戌为元大德二年（1298），这时王沂孙已下世多年了。明抄《唐宋名贤百家词》本和水竹居本《湘月》序均无纪年，“戊子”作“一日”，可知此序不一定是“戊子”作的。根据张炎与王沂孙的交游活动来看，应是宋祥兴元年即元至元十五年（1278）宋亡时于山阴作的。词有云：“堪叹敲雪门荒，争棋墅冷，苦竹鸣山鬼。纵使而今犹有晋，无复清游如此。”作者感叹东晋王子猷雪夜访戴和谢安弈棋而闻淝水之捷的胜地已非当年之盛，而是荒凉冷落。他又以东晋喻南宋，以为如果南宋存在，他们将做一番事业，而无如今的清游之兴。这所反映的历史背景也与宋亡之初相符。可见“戊子”当是“戊寅”之误，戊寅即至元十五年。可见《湘月》序并不能否定张炎北游十一年之说。

三

张炎（1248—1320？）字叔夏，号玉田，晚年号乐笑翁；祖籍西秦（陕西凤翔），生于杭州，为南宋中兴名将循王张俊六世孙。其曾祖父张铍官至司农少卿。祖父张濡为浙西安抚司参议官，于宋德祐元年（1275）三月，守独松关以拒元兵，擒杀元使臣廉希贤、严忠范等。父张枢仕宋为宣词令阁门簿书。元蒙灭宋后，获张濡杀之，籍没张氏家赀。张炎以先世恩荫在宋曾入官，宋亡时年三十二岁，被抄家后飘零无依，短期往山阴参加宋遗民咏物唱酬活动，于元至元十七年庚辰（1280）北游至元大都（北京）。张炎词题有一些纪年，可以略窥其行踪。从至元十七年庚辰到二十八年辛卯（1280—1291）的十一年间，张炎无江浙等处行迹，可考的只有十余首北游期间的作品。他后来在词里回忆北游时曾说：“十年孤剑万里，又何似畦分抱瓮泉”（《瑶台聚八仙》），“万里舟车，十年书剑，此意青天识”（《壶中天》）。从张炎生平活动来看，这时间“十年”（实为十一年，此举其成数）、行程“万里”，正是指其北游活动，与其词序所记时间符合，绝非指其中年后飘零往返江浙的某个十年。同时北游的友人曾遇，后来回忆北游也有诗云：“万里归来家四壁，沙鸥笑人空役役”（《大观录》卷十五）。可见“万里”都是他们用以特指北游行程的。

自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之后，佛经的翻译、編集、抄写之风日盛。隋开皇元年，京师诸大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汉译《藏经》印行最早于宋太祖开宝五年，造金银字佛经前后凡数藏，同年敕印雕佛经一藏，共十三万版，历时十二年完成，计四百八十函，五千零四十八卷。元世祖忽必烈崇奉佛教，宏扬佛法，“大量建造佛寺，担当上都筑城任务的刘秉忠，主持建造了乾元寺和华严寺，上都还有喇嘛教系统

的开元寺和八思巴帝师寺等，佛教寺院及僧尼人数急剧增加。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计有寺院四万二千三百十八所，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世祖至元六年（1269）在普宁寺，至元十四年（1277）在弘法寺，根据宋版刻印《大藏经》颁行天下”^⑦。至元十四年翻刻《大藏经》至二十七年春告竣，计一千四百二十二部，六千一十七卷，后世称为“元藏”。元初在翻刻《大藏经》的十三年间，又同时进行了以金泥抄写《金字藏经》的工作。元上都、大都等处重要寺院都得度《金字大藏经》一部。这样需要许多书艺精善的儒生文士参加抄写工作，成为一时的写经之役。赵孟頫于“大德丁酉（1297）除太原路汾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未上，召金书《藏经》，许举能书者自随，书毕，所举廿余人皆受赐得官”（杨载《赵公行状》、《松雪斋文集》后附）。由此可知，当时参加写经须由大官员举荐善书者，写经者在毕事之后可以受赐得官。元初最高统治者之所以发动写经之役还不仅仅为了弘扬佛法，乃企图以此作为笼络与强迫江南士人入仕的手段，使他们通过写经而接受朝廷的赐官。据释氏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帝（元世祖）命写《金字藏经》，卷轴前图像未定。帝云：‘此经是释迦佛说，止画说主，庶看读者知有所自。’……帝以金为泥，命僧儒缮写《大藏经》一藏，贮以七宝琅函，流传万世。”（《大藏经》卷四十九，二〇三六）这次写经之役，为时甚久，完成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元史》卷十六载，至元二十七年六月庚辰“缮写《金字藏经》凡靡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这说明此次写经完成的具体时间和共用去金之数目。清人赵翼谈到“元时崇奉佛教之滥”时也是这样理解的。他说：“至元二十七年缮写《金字藏经》成，凡用金三千二百余两。”（《陔余丛考》卷十八）可见，不能据《元史》所载而误认为至元二十七年才开始发起写经之役。张炎在《山中白云词》里有关几首北游的词序，完全避忌

谈到他曾参加过写经之役，而且其友人谈到此事时也含糊其辞，如谓他“尝以艺北游”（戴表元《送张叔夏西游序》），或言其“夜攀雪柳蹈河冰，竟上燕台论得失”（袁桷《赠张玉田诗》）。清人吴升编的《大观录》卷十五存《温日观墨葡萄画卷》题跋后附张炎《甘州·题曾心传藏温日观墨葡萄画卷》，此为其词集所未收。它提供了张炎参加写经之役的线索^⑧。同时参加写经之役的沈钦与张炎唱和，其《甘州》词序云：“心传（曾遇）索词屡矣，久以缮金字之冗，未暇填缀。玉田生乃歌白雪之章（指张炎《甘州》），汴沈钦就用其韵。”刘沆也有和作。张炎、沈钦、刘沆都是参加了写经之役的，这次唱和表示了他们不接受赐官而决定北归的愿望。他们是在书写《金字藏经》时唱和的，其起因是为曾遇客边所携藏的温日观墨葡萄画卷题词。曾遇字心传，华亭（上海松江）人，博学敏文词，尤工书法，“前至元末被选入京，书泥金字《藏经》”（《书史会要》补遗）。他珍藏的温日观墨葡萄画卷有一段不寻常的来历，其中还有深刻的政治寓意。后来曾遇为此画卷作的跋语云：

至元庚寅，以写经之役，自杭起驿入京。濒行之际，先一日过灵隐别虎崖长老，出至廊庑。一老僧素昧平生，闻余华亭音，迎揖而笑，握手归房，叱其使令于方丈索酒果款洽；执缣素者填咽其门，皆拒而不纳。问之，甫知其为温日观也。以（曾）遇将有行役，引墨作葡萄二纸，一寄子昂（赵孟頫）学士，一以见赠，且以荣名相期。此意甚厚。别后留燕，书经论事，将得官，而叢荐福之雷。此纸偶留集贤翰林诸老处，多蒙著语，大为归装之光。今遂哀集成轴。南还未及数载，不独温师化去，卷中名胜，半归鬼伯之阡。抚卷感叹，系之以诗曰：“我初不识温玉山，偶然邂逅湖山间。戏写葡萄赠行色，呼酒酌别期荣还。人言此僧性绝物，法书名画求不得。一时青眼信有缘，乡物乡人当宝惜。淋漓醉墨蛟

螭蟠，磊落圆珠星斗寒。疏略之中自精绝，工与造化争毫端。殷勤携上金台去，袖惹天香染烟雾。价轻不敢博凉州，但费玉堂题品句。万里归来家四壁，沙鸥笑人空役役。惟余翰墨烂生光，十年俯仰成陈迹。”曾遇自叙，大德改元，书于学古家塾。

——《大观录》卷十五

温日观，字仲言，号知归子，作水墨葡萄自成一家法。他是很有民族气节的士人，宋亡后出家于杭州玛瑙寺为僧。因与曾遇同乡，得知曾遇将北赴写经之役，特画墨葡萄以赠，“且以荣名相期。”意为勉励曾遇保持民族气节，勿屈辱受官，期望保住荣名而还。所以当曾遇、张炎、沈钦、刘沆等人书写《金字藏经》完毕，按规定“将得官”，他们展玩画卷时，它竟成为轰荐福碑之雷，使他们得以保住荣名。张炎《甘州》词云：

想不劳、添竹引龙须，断梗忽传芳。记珠悬润碧，飘飘秋影，曾印禅窗。诗外片云落莫，错认是花光。无色空尘眼，雾老烟荒。一剪静中生意，任前看冷淡，真味深长。有清风如许，吹断万红香。且休教夜深人见，怕误他、看月上银床。凝眸久，却愁卷去，难博西凉。

词的上阕赞美温日观墨葡萄之墨妙，描述其枝梗藤叶，浓淡间发，点染有灵趣。下阕借物寄意。这一枝墨葡萄甚是平淡，以前未发现其“真味”，现在临到将接受新王朝赐官时，由它想起了温日观“以荣名相期”的深意。于是它有如一阵清风，吹断繁胜的“万红”春梦。最后表示愿将画卷卷去珍藏，不愿为人轻易换取或出售。这寄寓作者不接受新王朝的赐官而宁愿归隐江南之意。刘沆的和词里表示赞同张炎之意：“珍重好，卷藏归去，枕屏间、偏称道人床。江南路，后会重见，同话凄凉。”终于他们为温日观的民族气节与所寄之深意感动了，抄写《金字大藏经》毕事之后便亟亟北归了。

曾遇题跋里有诗云：“价轻不敢博凉州，但费玉堂题品句。”凉州（甘肃武威）乃葡萄著名产地，此借指墨葡萄卷：“不敢博”即张炎所说的“难博”，为不换取、不出售之意。此表示不轻易接受赐官。唐以来习称翰林院为玉堂，此指仕元为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赵孟頫。赵孟頫与曾遇为旧交，他为墨葡萄画卷作了“品题”云：

去冬曾君自吴来燕，辱以一纸见寄，相望数千里不遐遗。乃尔展转把玩，因想胜风。欲相从西湖山水间，何可得也。因曾君出示此卷，敬书其后而归之。辛卯二月廿一日。

吴兴赵孟頫。

此跋后即附有张炎、刘沆、沈钦三首《甘州》词。赵跋所谓“辱以一纸见寄”，即温日观托曾遇寄给的墨葡萄。赵孟頫为曾遇所藏温日观画卷又题跋。此跋作于辛卯二月，张炎等唱和的《甘州》附跋后，跋与词当同时所作。以此可证张炎于辛卯春尚在燕蓟，旋即北归。这与张炎《甘州》、《疏影》词序所记“辛卯北归”相符，进一步证实他确于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北归的。又赵跋中云“去冬曾君自吴来燕”。“去冬”是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冬，则曾遇参加写经之役已是最迟的了，而抄经完毕之后，他是否与张炎同归江南，已不可考。张炎《甘州》词序言辛卯北归同行者只有沈钦，而并未提及曾遇。因此尚不能断定曾遇与张炎是于辛卯同时北归的。据江昱引《吴兴掌故》谓曾遇“元时以荐授湖州路安吉县丞”，则他可能写经完毕留燕而接受了赐官的。张炎是否与曾遇同时于至元二十七年庚寅由杭起驿入京的呢？江昱仅由间接材料推测他们是同时入京的，根据是张炎的《壶中天》词：

扬舲万里，笑当年底事，中分南北？须信平生无梦到，却向而今游历。老柳官河，斜阳古道，风定波犹直。野人惊问，泛槎何处狂客？
迎面落叶萧萧，水流沙共远，都无行

迹。衰草凄迷秋更绿，惟有闲鸥独立。浪挟天浮，山邀云去，银浦横空碧。扣舷歌断，海塘飞上孤白。

词有词题，龚本作“夜渡古黄河，与沈尧道、曾子敬同赋”，明水竹居本作“夜泛古黄河”。“沈尧道”即沈钦，其《甘州》词后印记有“秋江”、“尧道”，可知他名钦、字尧道、号秋江。沈钦后来同张炎北归。“曾子敬”不详，但绝非曾遇。曾遇跋温日观画卷后有印记为“曾遇”、“心传”、“寄静”，可知他名遇，字心传，号寄静。张炎夜泛古黄河从词题和词的内容都难以判断是初到或是北归，而很可能是北游期间游历并州等处夜渡黄河而作的，因为他有去并州的行迹。江昱以为“子敬疑即是心传”，但仅仅是怀疑，并无任何证据；于是又以疑为据而断定“曾心传题日观葡萄自序以至元庚寅入京，玉田固同行之侣。”江昱认定“夜渡古黄河”便是他们同行入京时初到黄河作的。显然这样的推断是非常不可靠的。我们仅从词中所述景物“衰草凄迷秋更绿”的秋景来看，张炎便未与曾遇同时入京，因为根据赵孟頫跋语，曾遇是至元二十七年冬北上的。张炎之北的时间仍应按《台城路》序所说的至元十七年庚辰。

从张炎的身世及其北游的有关文献所提供的线索来看，他的北游是蕴藏着难言的辛酸和痛苦，因而他与其友人都避免谈到。邓牧《张叔夏词集序》云：“中间落落不偶，北上燕南，留宿海上，憔悴见颜色。”这里提到北游之事，“留宿海上”是用西汉时苏武被匈奴拘留北海牧羊自食之事，暗示了张炎北上是有被迫性质的。舒岳祥《赠玉田序》云：“宋南渡勋王之裔子玉田张君，自社稷变置，凌烟废堕，落魄纵饮，北游燕蓟，上公车、登承明有日矣。一日，思江南菰米莼丝，慨然襆被而归。”有学者由此认为张炎“甫得官，辄为人所阻”；或以为“张炎是准备向新王朝屈膝的，虽然他事实上并没有做新王朝的官”。这都属于误解。“社稷变置”谓元蒙取代了宋王朝，“凌烟废堕”谓宋室

凌烟阁毁坏，意指功臣贵胄没落；“承明”用曹植诗“谒帝承明庐”，谓皇帝诏见。舒岳祥之意实为：张炎在宋亡后，家遭巨变，失意落魄，北游燕蓟时有了登上官车而接受皇帝诏见的希望，然而他却慨然回到江南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张炎为南宋中兴名将张俊之后，世受宋恩，宋亡后被抄家籍产，于至元十七年庚辰（1280）被元蒙统治者胁迫北上燕蓟至大都；时值元初写经之役，不久因被荐而参加了缮写《金字藏经》的工作；写经完毕，元王朝准备赐予官职，而他因与元王朝的世仇与籍家的新恨，在温日观民族气节的感动之下，遂拒不受官，慨然北归，至元二十八年辛卯（1291）二月以后北归，前后在燕蓟共十一年，北归后在江南过着飘零愁苦的遗民生活。

注：

①见吴则虞《玉田年表》，《山中白云词》第155—159页，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冯沅君《玉田先生年谱》，《张玉田》，民国十七年朴社出版。

②杨海明：《张炎北游之行探测》，《文史》第十六辑，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

③《唐宋名贤百家词》抄本、天津图书馆藏，北京图书馆有传抄本，又有林大椿校，民国二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④见吴则虞校《山中白云词》第213页。

⑤见吴则虞校《山中白云词》第156—157页。

⑥转引自吴校《山中白云词》第38页。

⑦引自〔日〕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第282—283页，郑彭年译，198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⑧张炎《绮罗香·红叶》“慢倚新妆，不入洛阳花谱”，别本作“小字金书，心事已成尘土。”吴则虞先生根据别本认为“小字金书”即指北游写《金字藏经》事，于《玉田年表》公元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庚寅）下

云：“秋九月北行，写《金字藏经》。《绮罗香》赋‘红叶’有‘小字金书’语，恐亦作于此时。”按，此题为咏红叶“小字金书”乃用有关牡丹之事，龚本“洛阳花谱”即指牡丹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尝谒钱思公（惟演）于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坐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余种。’”（《居士外集》卷二十二）证以龚本此句当拟托牡丹追忆当年盛日情景，甚感而今凄凉冷落之意，非指《金字藏经》也。

作者工作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韦庄〈秦妇吟〉校笺》献疑一则

陈寅恪先生《韦庄〈秦妇吟〉校笺》第136—137页诠释“前年又出杨震关，举头云际见荆山”二句曰“……《元和郡县图志》六河南府新安县条略云：‘函谷故关在县东一里，汉武帝元鼎三年，为杨仆徙关于新安。今县城之东有南北塞垣，杨仆所筑。’同书七虢州湖城县条云‘荆山在县南，即黄帝铸鼎之处’。然则杨仆关正在新安之地，与下文‘明朝又过新安东’之句行程地望皆相符合。颇疑‘杨震关’乃‘杨仆关’之讹写，殆由传写者习闻东京之‘关西孔子杨伯起’，而不知有西京之楼船将军，遂少致误耶？”（见《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细读《秦妇吟》本诗，则见先生所言颇难成立。其一，诗中先写“前年又出杨震关，举头云际见荆山。”（前年似应为前日之误）又写“陕州主帅忠且直，不动干戈唯守城。”又写“明朝又过新安东，路上乞浆逢一翁”。行程顺序十分清楚。若杨震关为杨仆关之误，杨仆关在新安，当在陕州主帅之后叙及。（陕州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而不应置于此前。其二，如陈先生所言，荆山在湖城县境内（湖城在今山西芮城县南、潼关之东）。湖城在陕州之西，距新安之杨仆关尚有二百里之遥，若杨震关为杨仆关之误，则诗中所言“前年又出杨震关，举头云际见荆山”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因此，杨震关在本诗中并非误写，它指的是当时的潼关，因东汉杨震葬于附近，故又称杨震关。这种解释与诗中所言行程地望正相吻合，即出杨震关（潼关）后见荆山，又至陕州，又至新安东。

• 马 新 •